

文学评论要拒绝“春秋笔法”

李 壮

“王顾左右而言他”。这篇小说写的是什么主题？赶紧把脑中古今中外文学名篇都翻找一遍，下笔将相关主题的演变谱系梳理一番，最后留一句话落回到手头的作品：“如今，这篇小说又为某某主题的文学长廊增添了新的形象。”接着再往下走——这篇作品使用的语言是什么风格？民间一点的叫“表情丰富充满活力”，学院风格的说“长于刻画复杂经验”。人物关系是什么结构？一个人贯穿全场叫“独语的魅力”，两个人分分合合可以谈“自我与他人”，三人以上扯不清楚那就是“现代社会的复杂关系处境”。搬出几个西方大理论家的名字，用那套驾轻就熟的理论话语阐释装点一下，看看文章字数，差不多能够交差了。但通篇没说过几句有实际意义的话，甚至连像样的文本分析都没有，全程都是在躲着文本说空话，这终究有点良心不安。因此，犹豫再三还是在文末留下这么一截遮遮掩掩的“真话”的尾巴：“某某的这篇小说，虽然在某某方面、某某角度还存在较明显的提升空间，但总体看来，依然不失为是一篇较能够打动读者的作品。”

文学评论里的这种“春秋笔法”，看似皆大欢喜，其实却是对读者和作者的双重不负责。就广大读者而言，倘若他们读完这类貌似褒扬的文章，也跟着去去读原作品，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也许会感受到了欺骗，对文学评论失去信任，也许会接受错误的引导，以劣为佳，审美水平被大幅拉低。作者也未必能获得什么好处，即便虚荣心能享受到片刻的满足，但该戳破的问题没有被戳破，今后的写作依然会在同一道门槛上反复跌倒。更令人痛心之处在于，虚假的好评会让真诚的赞美蒙羞，轻妄的判断会使认真的判断失效。

真话和良心不能缺席。文学评论需要的不是遮遮掩掩的“春秋笔法”，而是有的放矢、有一说一、一针见血。不可否认，当下的文学界在多数时间都是一团和气的，想要在所有人都保有分寸的场合独自提出明确的批评意见，这

确实需要勇气。然而，总体的生态固然需要调整改进，我们也不要忘记，大气候是由其中无数小分子共同构成的；反躬自省、从自身尝试改变，这是每一位评论者应有的担当。此外，我们也都能够理解，评论家在准备提出批评意见的时刻，总会有内心深处的顾虑；毕竟古今中外，许多从事文学批评的人都曾受困于审美惯性和眼界宽度，以致错误地贬低过一些有价值的作品。然而在当下，最严峻的问题并不是“错批”，而是“无批”甚至“错捧”。从纯粹的文学史学术层面看，“错批”造成的遗憾确乎不少；在文学生态乃至世道人心的角度讲，“无批”和“错捧”的危害其实更大。前者无非是遮蔽，后者却是在败坏。

我们所提出的观点、得出的结论难免会有失准的时候，但这并非是无法弥补的过错，因为不论将等待多久，时间与人心总会把最终的判决书送抵于一切判断者与被判断者的面前。真正难以承担的，是“故意失准”对文学造成的伤害。用所谓“被败坏的赞扬”去赞美那些明显配不上赞美的文本，对真正的好作品是巨大的不公；虚与委蛇固然是代价小而收获大的讨巧做法，但长远来看，文学批评的尊严和公信力将因此遭受不可逆的损失。判断失准和有意违心终究是完全不同的事，前者仅关乎能力水平，后者却涉及职业道德。我们总是说今天的文学评论工作还有待提高，这样那样的问题都需要解决……其实在我看来，其中最致命的短板，还真不是专业能力的不足，而是职业道德的缺失。

文学评论中的“春秋笔法”虽然只是“小花招”，但若不以以为意、甚至对此理直气壮，那么就很容易滑向职业道德的“大失节”。因此，作为一个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人，我会从自身的写作开始警觉，并对自己设下这样的期许：几十年后，当我在垂老的病榻前回想起一生所下过的判断，我能接受自己为识见和才能上的局限而感到惭愧，但绝不希望自己因品德上的污迹而感到羞耻。

乡村振兴中的文学力量

——《新山乡巨变》的独特价值

白 烨

余艳的纪实作品《新山乡巨变》(湖南文艺出版社)，是纪实文学领域里的一个独特的题材、特殊的文本。

《新山乡巨变》这个书名既暗示作品与周立波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山乡巨变》的内在勾连，又显现了“山乡”新的巨变，今昔的对比鲜明，有很强的艺术概括性。

我有两个方面的突出感受。第一，作品由过去与现在的接续和当年与如今比较的方式，写出了山乡巨变诞生地——清溪村和益阳市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以“新清溪”“新农村”“新农业”“新农民”四个方面的“新”，形象地表现了当年山乡新的巨变，以及新的山乡巨变的样态、方式、路径与模式。

周立波小说里的“清溪村”，是作家依凭自己的想象虚构出来的，原型是益阳郊区的邓石桥村。因为《山乡巨变》的影响深远，使得小说里的清溪村声名远播，人们便把邓石桥村改为了清溪村，并在村子的入口处立了一块“山乡巨变第一村”的石碑。清溪村的切实改变，也是数十年来的事。清溪村人要把文学中的“山乡巨变第一村”，打造成现实中的“山乡巨变第一村”。作品由此写出了清溪村人借助文学与文化的力量，从生态、卫生到居住环境的切实改变，从农牧结合到农旅结合的产业开发，使得清溪村满含文化内力，充满诗情画意，真正成为清溪人为之骄傲的美好家园、外地人流连忘返的文化园区。

作品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第一章紧紧围绕周立波故居的修复建设以及修建过程中带来的种种问题，写出了人们对于周立波文学遗产的高度重视，以及这种格外珍重和保护利用不断给清溪村带来的新的变化。最后一章写到的新农民里，有一个一直对粮食的增产很有兴趣的王保良，一生崇尚两个人：一个是袁隆平，一个是周立波。一个是物质粮食的专家，一个是精神食粮的作家，把两个不同领域的典型和楷模自然而然地对接起来，表现了王保良的独到追求。也可以说，整个作品实际上写了清溪村或者泛清溪村发生的新变与巨变，是以文学为抓手，以文化为内核的综合发展的丰硕成果。

第二，这部作品以独到的方式，写出了经典作品的深刻影响，以及文学所具有的能动作用，深刻揭示了文学和生活密切联系、相互促动的特殊关系。



《新山乡巨变》书影

把原来的村名——邓石桥村，改为了小说里的村名——清溪村，背后是乡亲父老对周立波《山乡巨变》的充分认可，对小说里颇具诗意的村名的真心欣赏，以及对周立波精神的高度推崇。

《新山乡巨变》反映了邓石桥村改为清溪村之后，村容村貌不断变化，继而农业生产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带来生产形态与生活方式循序改变，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思想状态与精神风貌也得到不断升华和深刻改变。一系列巨大变化，是清溪村的乡亲父老本着为《山乡巨变》增光，不辜周立波的殷切期望而奋力打拼的喜人成果，充分彰显了文学对于生活的积极影响。

可以说，《山乡巨变》是周立波以文学的方式，对养育了自己的家乡故土，所作的自觉的反馈与主动的回赠。而以清溪村为代表的“新山乡巨变”，是清溪村人怀揣梦想的不懈追求带来的现实新变，续写“山乡巨变”的新华章，并以这种方式彰显文学本有的能动力。

周立波从生活出发写出了《山乡巨变》，余艳的《新山乡巨变》，也是从生活中来再到生活中去。作品中写到清溪村人说周立波一直都和他们在-起，我觉得这个意思表达得很好，有着自己的独到韵味和独特价值。

世界生态文学经典很多都是散文，或者说主要是散文，这是由散文文体的特质决定的。散文可以更充分地包容和表现自然的属性和美、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长于感悟抒情和解释式描述，能叙能议，启智启美。散文是具有无限审美可能性的文学类型。每一篇生态散文都有必要最大限度地扩充容量，就像给气球充气，以不爆破为前提达到最大容积。

引入科学视角

生态散文写作要引入科学视角，包括科学知识、科学规律和科学思维。我视写作中引入的科学视角为认识事物的望远镜、透视镜、显微镜和解剖刀；引入科学视角，是为了更精准地写出事物的真度、新度、深度和广度，更好地展现自然美、客观规律美和揭示哲理美，更利于感悟和解剖社会、人生。

生活、思想和科学视角，我视之为驱动生态散文金马车的金轮子。体验、体悟科学知识其实也属于作家体验生活的形式之一。未经过作家有效体验和体悟的科学知识，所蕴含的哲理、情感将难于被发现和挖掘，科学性与作品将成两张皮。

写作实践告诉我：科学元素一旦被思考得达到火候，融入科学元素的作家情感也会发酵得较为成熟，基于科学元素的情感与思想将互动而激荡，想象与联想会纷至沓来，这表演，科学性和文学性已深度融合。

在生态散文写作中引入科学视角，是适应时代的需要。倘若科学时代的文学还回避或不注重包含科学元素，至少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广度上是有所局限的。

追求“大生态散文”

仅以一般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审视写作问题，易陷入一些认识盲区，写作难于深化。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先生关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三态论”，已然提供新的视角，有启示意义。

一直以来，我们注目自然生态与人的精神生态多，关注社会生态少。有必要将社会生态放在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中独立而又联系地作深入考察。生态散文倘若未能深入地揭示“三态”矛盾，你想臻入大境界，是不太可能的。成功的生态文学作品如《鼠疫》《狼图腾》，都切入或复合表现了“三态”，应该说，切入“三态”的写作，已走到了前面。

在生态视域下，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虽有一定的批判、反思和诘问，却未能更深入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进行省思，这一类散文可界定为“小生态散文”。而大生态散文，则须深入探讨及艺术地表现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关系及问题，强调人的谦卑与担当，崇尚“天人和美”，已然进入哲学境地的美学散文。

增加“思想量”

生态散文容量的扩充，离不开作家的独立思辨和批判能力。生态散文如果不具理性批判，“思想量”虚无，内涵必然是干瘪的。

任何一位想有所作为的生态散文家都应该有想做生态思想家的“野心”，至少也该是生态思想者。倘若我们的作品仅仅停留在对自然的摹写，仅仅是抒写自己是如何在山中水边观察和生活，乃至写如何深爱自然，即便情感再感人，我认为还是远不够的。

在我看来，生态文学与其他文学最大的区别，恰恰就在于生态文学具备真正认识意义上的对“新的现代生态伦理”的文学性阐释、文学性表现、文学式探索以及增量性贡献。现代生态伦理观“大地共同体”思想，就是在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这本散文里率先提出的。

如何从自然中解读和提炼“精神”？怎样从自然中获取精神元动力，以建构新的尤其是中国现实版的生态伦理，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课题。

《山西新诗百年》出版座谈会举办

7月5日，由山西文学院(山西网络文学院)、山西省作协诗歌专业委员会、北岳文艺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山西新诗百年》出版座谈会”在太原召开。

与会者分别就《山西新诗百年》出版的价值、意义以及入选诗人、诗歌作品等方面进行研讨。大家认为《山西新诗百年》是一部能够展示山西新诗百年历史和山西诗人重要创作成果的优秀诗歌选本，展示了山西新诗百年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创作脉络。与会者指出，要以《山西新诗百年》出版为契机，认真总结山西新诗百年的成绩、经验，加强对诗歌创作规律、特点的研究，促进山西诗歌持续繁荣发展。

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杜学文发言时说，要认识到山西诗歌在全国诗歌界的地位、作用、贡献和影响，在创作上有大格局、有新探索，特别是广大优秀青年诗人既要沉下心来，潜心创作，也要闯得出去，加强与全国诗歌界的学习交流，展示山西诗歌的力量；省作协努力营造良好的诗歌创作环境，激励诗人创作，期望山西诗人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涌现出更多的诗歌名家、大家。山西诗歌的发展，有赖于诗人们对中国诗歌精神一代代的传承与创新。希望山西诗人们继续肩负起历史责任和使命，为推动山西诗歌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为生态散文扩容

杨文丰



虔诚地记录与思考

《所仪的世间》散论

刘媛媛

在一个空前缭乱的年代，坚持用文字记录生活，并且虔诚地用书本的形式留存下来，这是一种怎样的情结与夙愿？我想，除了拳诚热爱没有别的答案。赵月琴就是这样一个人中了文学“蛊”的人。拿到她创作的《所仪的世间》(上海文艺出版社)书稿，文学的魅惑魔力再一次击中我日渐老化迟钝的艺术感觉。

打开作品，习惯性地先看作者自序，因为从作者自序中不仅可以了解写作动机，还可以看出作者的心性和文字风格。作者在序言里坦言道：“而我，在这些文字中，找到了独立知性，找到了可爱伶俐，找到了奋勇搏击，找到了细腻温婉，找到了友爱良善。其实，我本身也是一个宝藏啊！这想法跳出来时，我被感动到了，为自己曾经的不易、艰辛与苦苦挣扎，也为内心深处久久不灭的理想之光。原来，只要你愿意，你自己就可以是一道光、一束花，喜悦自己的同时，也影响到别人。”这份格外的自信

和自我生命的恣意伸展很打动我。由此可以猜想，作者的心态是昂扬的、充满活力和激情的，她笔下的文字应该是真实坦诚的，这样一个个体生命对生活的观察和记录，纵使平凡日常，因为有了虔诚之心，也会打动人心引发共鸣。

《所仪的世间》包含了作者在生活中所见所感、所思所想，有对亲情的深情凝望，有对婚姻情爱的感悟反思，有对日常人事的剖析思考，更有作为生命个体对实现自我价值的梦想追求。开篇的《真女人》作为某种宣言，奠定了此书的基调，也道出了作者作为女性的心声：“想微笑着贴一句，做真女人真好。是的，做女人，可以为母，对孩子体贴入微；可以做妻，得珍惜、珍爱之福；可以做女儿，穿多彩的衣服……女人的爱可以很简单，可以很直接，可以最接近于现代心理学追求的‘身心合一’。以这种基于性别的自我肯定，作者摒弃了小女人散文胎里带的娇柔之气，显示出一种飒爽英气。同样是写自我生活，赵月琴的关注点更多是在身边的人、物、事上，通过自己的观察感受，上升到哲学思考，并得出自己的判断。比如《青石板下的小草》，从随处可见的小草写到破口的青石板，因为在那里体会到了物我的相融，生命的琴弦被古老的青石板拨动，而那些青石板下的小草，又触发作者对生命的感悟：“然而，那风中摇曳的青石板下的草啊，是谁让你有了如此大的动力，一定要破石而出，坚强地生下来、活下去呢？青石板下的小草，滋养它的除了老天落下的雨水、坡上流下来的洪水，还有那久久无人问津的寂寞和一脚脚恣意的蹂躏，是的，滋养它最多的便是那不理和蹂躏。”

从写作角度看，我认为赵月琴写得最好的文章是关于亲情、爱情的文章，因为熟悉，也因为感受深刻，下笔自然不同。

在写作风格上，作者给我的最大感受是朴实无华，直抒胸臆，有一种自然、不事雕琢的拙朴之美。她写景叙述多于描写，更注重景观的历史人文背景，并由景及人，触发思考。读书作文，是中国人基因密码里古老而又神圣的一环，融入每个炎黄子孙的血脉，是中华文明赓续的源头。赵月琴这本书，不确定会走多远，但一定是粒小小的星火，星火汇聚起来，就成了照亮梦想的光芒。



本版图片来源：百度

批评的历史感与现实关怀

徐 刚

我从事的批评工作，最初是电影与文化研究，进而成为作家和作品分析，到如今将文学史研究也逐渐“批评化”。这种“以论带史”的形式，本意其实并非将冷静客观的“研究”叙述成观点偏颇的“批评”，而是要在枯燥繁冗的“历史”之外，展现“现实”鲜活的问题视域，在“历史”的“重读”之中，寻找一种“有思想”的学术，进而成全一种“有学术”的思想。不断寻找二者相互支援的合理路径，这便是批评的历史感与现实关怀的意义所在。

于我而言，批评就像是艰辛的跋涉，穿越语词的密林，只求不沦落为虚无的冒险。因而，无论是指向历史的学术研究，还是切近当下的文学(文化)批评，无论是厚重严实的文学史现象、小说文本，还是让人眼花缭乱的文艺风潮、影像制品，对我来说都没什么不同，一切都是“细读”“剖析”的对象。问题在于，如何在平实而诚恳的论述中，深入文本的内在肌理，同时力避“学院派”惯有的迂腐与呆滞，这是我努力追求的批评风格。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归根结底，批评或许只是一种态度，它集中呈现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多数的批评者将李健

吾“寻美的批评”奉为圭臬，这也难怪，“灵魂在杰作中的探险”固然让人心旷神怡，可这样的时代，纯粹的审美却多少显得有些廉价。批评不是抚慰，它更需要的是一种拆解的能力、一种阐释的方式、一种富有力量量的表达，但这一切都要以审慎而令人信服的方式展开。批评，是批评家认识这个世界，并经由身处的世界来反观自我的方式，通过文本来阐释世界，进而与实践的层面探寻一种新的历史可能。由此而言，理论的穿透力所带来的历史纵深感，其所囊括的社会宽度，以及通过文本的细节阅读、精微的分析所达致的作品阐释力，都显得至关重要。批评远非是要判断或鉴赏某个作品，而是要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与分析，进而打开这个隐秘的世界的一角。它面对的不仅仅是语言的纹路和肌理，虚构的世界里那些宽广博大的人物内心，抑或如深渊般无比幽暗的人性本身，更要面对整个丰富而胶杂的外部世界，在更高的意义上阅读历史和社会。

我忍不住幻想一种批评，它紧紧扣住此在的世界，并将精微的分析与诚挚的热情，融入到对于历史可能性的冀望之中。

